



端阳也称端午,是我国的传统节日。从端阳的第一天到端阳的第五天,也就是端午,连续五天。在这些日子里,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是如何度过的,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,愉快与不愉快、幸福与不幸,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。

第一天,贾母、薛姨妈、凤姐、宝玉、宝钗、黛玉、迎春、惜三春等人去清虚观打醮。听说要去清虚观,别人还可以,“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出不得门槛儿的,便是个人的主子懒怠去,她也百般的撺掇去”。但是,王夫人没有去,她的两个丫头金钏儿与彩云只有跟了凤姐去。

在清虚观,张道士问宝玉的年龄,要给宝玉提亲,又端来一盘子小道士的贺物,宝玉看见一赤金点翠的麒麟,宝钗说,史湘云也有这么个物件,只是小些。宝玉听说,“他就揣着,却拿眼睛瞟人。只见众人倒不大理论,惟有黛玉瞅着他点点头,似有赞阿之意”。

第二天,宝玉听说黛玉中暑了,前去探望,因为张道士昨日提亲的事,话不投机,两人反而闹起别扭。宝玉“见黛玉脸红头胀,一行啼哭,一行气滚,一行是泪,一行是汗,不胜怯弱”,后悔不该与黛玉“较正”。“这会子她这个光景,我又替不了她,心里想着,也由不得滴下泪来”。老婆子们见二人闹得不可开交,急忙告诉了贾母,还是“贾母带出宝玉去了,方才平复”。

第三天,二人和好,去贾母处,见到宝钗,因为天气热,宝钗体丰怕热,宝玉将其喻为杨妃,宝钗很不愉快,换了一种方式将宝玉奚落了一番。

第四天,宝玉去王夫人处,与金钏儿调笑,王夫人认为金钏儿勾引宝玉,给了她一个嘴巴撵出去。宝玉跑回大观园,“暑中阴晴不定,片云可以致雨”,丫鬟们把沟堵了,把水积在院内,将“绿头鸭、花鸂鶒、彩鸳鸯”,放在院内玩耍。宝玉把门叩得山响,然而里面玩得热闹,没有人听见。宝玉“一肚子没好气,满心想把开门的踢几脚,及开了门,并不看真是谁,还以为是那些小丫头子们,便抬腿踢在肋上”,把袭人踢倒在地,而且踢得

端阳纪历

□王 彬

不轻,晚间袭人吐血了。

第五天,王夫人请薛姨妈、凤姐、宝玉、宝钗、黛玉等人赏午。因为前两天的事情,大家都无兴趣。宝玉回到怡红院,偏生晴雯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上,将扇骨跌折了。宝玉叹息道:“蠢才!蠢才!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,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?”晴雯听了宝玉这个话,冷笑道:“何苦来!要嫌我们,就打发我们,再挑好的使。好离好散的倒不好?”宝玉听了这话,气得浑身乱颤。袭人前来劝解,却被晴雯挖苦罢了。宝玉对晴雯说:“你也不用生气,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你也大了,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?”听了这话,晴雯哭了起来,宝玉也伤感地滴下眼泪。晚间宝玉吃酒回来,为了讨晴雯欢喜,让晴雯撕扇子,晴雯把扇子一把接一把撕为两半。

第六天,端午节过去了,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,但大体平安。中午,王夫人和宝钗、黛玉众姊妹在贾母房中间坐着,史湘云来了。一会,宝玉也来了,夸奖史湘云会说话,黛玉听了冷笑道:“她不会说话,她的金麒麟也会说话”。史湘云随宝玉来到怡红院。贾政打发人叫宝玉出去会见贾雨村。宝玉很不高兴,湘云劝他:“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,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,也好将来应酬世务,日后也有个朋友。”宝玉听了很反感,对湘云说:“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,我这里仔细脏了你知经济学问的。”又说:“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?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,我早和她生分了。”黛玉正好来到怡红院,听见宝玉这番话,不觉又喜又惊,又悲又叹。而这时,宝玉见到黛玉,向她表达爱慕之情,黛玉听了这话,不觉滚下泪来,头也不回走了。袭人给宝玉送来扇子,宝玉不知黛玉已经离开,错认为她就是黛玉而继续倾诉。

宝玉来到王夫人处,听说金钏儿“含羞赌气自尽,心中早已五内摧伤”,被王夫人数落了一顿,“背着手,低着头,一面感叹,一面慢慢的走着”。刚转过屏门,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,“可巧撞了个满怀”,这人就是贾政。贾政见他这样“藏藏蓊蓊”的样子,很是生气,这时

忠顺亲王府的长史官来到荣国府,向他要一个唱戏的琪官,说是琪官被宝玉隐藏在什么地方去了,贾政气得“目瞪口呆”。贾环这时走过来,说宝玉拉着“金钏儿强奸不遂,打了一顿。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”。贾政眼都红紫了,喝令将宝玉“堵起嘴来,着实打死”。王夫人知道了,慌忙赶来,见到王夫人,贾政更是火上浇油。这顿打非同一般:“只见他面白气弱,底下穿的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,禁不住解下汗巾看去,由臀至胫,或青或紫,或整或破,竟无一点好处”。王夫人见状,不觉失声大哭起“苦命的儿来”,忽又想起大儿子贾珠,便叫着贾珠哭起来,“别人还可,惟有官裁(贾珠的妻子李纨)禁不住也放声哭了。贾政听了,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落了下来”。直到贾母赶来,贾政才住手,贾母训斥贾政,说到情深之处,“也不觉滚下泪来”。

总结这六天,第一天,去清虚观打醮祈福,非但没有求到福气反而在宝、黛之间制造了猜忌的根芽;第二天,宝、黛猜忌加深;第三天,二人和好,一起到贾母处,因宝玉说话不当,受到宝钗奚落;第四天,宝玉与金钏儿调笑,王夫人把金钏儿撵出去,宝玉把袭人踹了一脚;第五天,王夫人请大家赏午,本应是一个喜庆的节日,但是因为前几天不愉快,大家都觉得无意思;最后,第六天,端午节过完了,宝玉因为金钏儿与琪官的缘故,被贾政狠狠地打了一顿。五月是恶月,五月初五更是恶月恶日,在东汉的《风俗通义》中甚至记载:“五月初五生子,男害父,女害母。”因此在五月的开端,在端阳节里,人们要采取各种措施祛除、禳解,贾府中的人们也是如此,无论是主人还是丫鬟,从贾母到金钏儿,从宝玉到袭人与晴雯,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,大家都没有躲过,宝玉没有躲过,袭人没有躲过,金钏儿更没有躲过——虽然她也曾去清虚观打醮,这里面是什么在起作用呢?在这些日子里,黛玉猜忌湘云,宝钗奚落宝玉,宝玉踹了袭人,晴雯与袭人争吵,为了宝玉,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而生气吵嘴伤心落泪,宝玉与黛玉互诉情愫不是在欢庆的时候,而是在不愉快的猜忌之中,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?联想袭人传达元春的话:“昨日贵妃差了夏太监出来,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,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,唱戏献供,叫珍大爷带领众位爷们等跪香拜佛呢。”虽然如此,灾难依然没有躲过,作为恶月,五月对宝玉而言的确不虚,对金钏儿则更是灾难,是以年轻美丽的生命为代价的,这样的五月,这样的端阳,也过于残酷了。

五月的妖祟与鬼魅,真的难以回避吗?



玄览堂笔记

除了纯粹的应用文之外,无论写什么文章大约都不可过于执著粘滞。一味死死地抱着中心或主题,容易显得干枯乏味紧张吃力,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兴味。这就需要放得开,收得拢,纵之令远,而又手到擒来,指挥倜傥,舒卷自如;前人讲所谓“开合”、“擒纵”、“起落”之类,说的都是这样一层意思。

例如叙事,笔墨如果太粗,仅仅略陈梗概,就很难生动;而如果太细,又容易冗长拖沓。老舍先生说:“叙述不怕细致,而怕不生动”;“细写不算不对,但容易流于冗长。为矫此弊,细写须要拿得起,放得开。占人说,写文章要精骈八极,心游万仞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作者观察事物,无微不至,而在叙述的时候,又善于调配,使大事小事都能联系到一处,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,天昏地暗,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,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。大开大合,大起大落,便不至于冗细拖拉”(《出口成章·谈叙述与描写》)。这是他的经验之谈,也是对文章学规律的很好总结。

这种场合下的开合起落,就是在叙述某一事物时,不要老盯住一点细写,而能找出新的角度,换一生长点再写,这样既能把所叙述的事物写透彻,又不至于冗长乏味。“开”是说拉开来,“合”则是指又回到原先要叙述的事物;“起落”是说文章有跌宕起伏变化,不是老在同一高度上。飞行特技表演住往起落变化很大,赏心悦目,进乎技矣,也是这个道理。

鲁迅先生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自题(为了忘却的纪念)以叙事为多,但他并不径写自己同五位青年作家的关系,却先行引用《文艺新闻》上林莽(楼适夷)的《白莽印象记》,这可以说是一放;但马上说“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”,接下来记叙自己同白莽(殷夫)的交往,这就是一收。在谈到自己送了两本德文本裴多菲的集子给白莽时,顺便介绍两本书的来历道——

那两本书,原是极平常的,一本散文,一本诗集,据德文译者说,这是他搜集起来的,虽在匈牙利本国,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,然而印在《莱克朗氏万有文库》中,倘在德国,就随处可得,也值不到一元钱。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,因为这是三十年前,正当我热爱彼得菲(按现在通译为裴多菲——顾农)的时候,特地托九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,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,店员不肯经手,开口时非常端端。

言之娓娓,似乎有点离题,其实乃是又一放,马上又收回来道——

后来大抵带在身边,只是情随事迁,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,这回便决计送给他如我的那时一样,热爱彼得菲的诗的青年,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。所以还郑重其事,托柔石亲自送去的。谁料竟会落在“三道头”之类的手里呢,这岂不冤枉!

这样就与白莽挂得很紧了,又带出了柔石,为下文要重点写柔石作出了准备。

这样忽放忽收,便显得灵活飞动,情味浓郁;如果平铺直叙地写自己同白莽的来往,第一次如何,第二次怎样,一五一十,按部就班,那就没有多少味道了。

以上说的是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的第一部分,如果总揽其全文来看,则第一部分完全写白莽,第二部分重点写柔石兼及冯铿,第三部分合写白莽柔石,第四部分写他们的被捕和自己的反应,兼及李伟森和胡也频,而又归结到白莽翻译的《格言》这里来,第五部分以抒情议论收尾。就文章主体的第一至第四部分而言,写五烈士而以白莽为叙事的线索,可谓大开大合;而第一部分本身,则可谓之小开小合。

如果并列地写五个人,再按固定的顺序(例如时间顺序)写自己同他们每个人的交往,条理也许是清楚的,而全失灵动之致,甚至可能显得呆头呆脑,那就不是鲁迅了。

议论文同样存在讲究开合、擒纵之必要。鲁迅先生的又一篇篇《拿来主义》,正面来讲这种“主义”的其实只有最后三个段(第8、9、10自然段),而前文已经三处提到“拿来”,分别第2、5、7自然段,所以此文实有三放三收,或曰三擒三纵,反复盘旋蓄势,最后才直入中心。全文波澜迭起,疏宕有奇气。笔者曾经有一文专门分析此事,这里不去多说了。

鲁迅先生有一篇大骂梁实秋的文章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,是所谓“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”(鲁迅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信)者,此文采用了抱着题目分层论证的方法,但即使在这样的单刀直入的攻坚战之中,也不乏开合擒纵的笔墨。文章在引用了梁实秋《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》中的一段原文之后,紧接一段议论道:

这正是“资本家的走狗”的活写真。凡走狗,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,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,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,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,正是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的原因,也就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证据。即使无人豢养,饿的精瘦,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,不过这时它就更不明白谁是主子了。

然后才回过头来具体分析梁实秋这一论敌。从逻辑上说,先来这么一段是为了树立大前提,而从文章学的见地来看,实为荡开之笔。古人说:“文字之妙,须乍近乍远,一浅一深。说渐近了,只管说得逼窄,无处转身,又须开一步说。如行舟者,或逼近两岸,须要拨入中流,方得纵横自在。”(李贽著《山居杂著》)指出梁实秋《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》一文实为其招供的自画像,业已逼近论敌,于是鲁迅一笔拓开,讲一般走狗与“丧家”走狗之不同,然后再归结到眼前的论敌上来,这正是一放一收,一开一合,稍一纵之,继之以擒,更显得完全不把论敌看在眼里,对于战而胜之有着绝对的把握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的烽火硝烟现在早已散去,其间的得失亦颇难言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中的名篇研究文章的笔法。

有些文章在全局上搞大开大合(如《拿来主义》),有些文章在局部上搞小开小合(如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),有些文章两种开合兼而有之(如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),各有所宜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。

古人早已注意到开合有大局与局部之分,如说:“虽笔之变化无常,而有一定之开合……以一篇之开合言之,或一段一段正,一段虚一段实,此开合之大者,则局为之也。以一段之开合言之,或时而断时而续,时而纵时而擒,此开合之小者也,则笔为之也。”(王葆心《古文辞义疏·作法十三》)涉及文章全局的以段为单位的开合,谓之大开大合;涉及相关段落的以句或句群为单位的开合,谓之小开小合——小大由之,各有各的用处。

刘熙载说:“古文,大开大合,小开小合俱有之”。《艺概·文概》)而鲁迅文章中亦俱有之。

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一书中有《柳敬亭说书》一则,其中介绍柳大师的高超艺术道:

余听其说“景阳冈武松打虎”,白文与本传大异。其描写刻划,微入毫发,然又找截干净,并不唠叨。有时声如巨钟,说到筋节处,叱咤叫喊,汹汹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,店内无人,蓦地一吼,店中空缸空壁,皆嗡嗡有声。闲中着色,细微至此……每至深夜,拭桌剪灯,素瓶静递,款款言之,其疾徐轻重,吞吐抑扬,入情入理,入筋入骨,揣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,不怕其瞠舌死也。

这里说柳敬亭说书既非常细微,而并不唠叨,他的诀窍正是拿得起,放得开。表演武松大吼大叫,一派英雄气概,但老是叱咤叫喊也不是办法,于是又去讲空缸空壁嗡嗡的回声,作侧面的烘托。有开有合,有起有落,所以能够细而不冗,引人入胜。张岱文章里说的“疾徐轻重,吞吐抑扬”,大约是兼就其声调而言,高潮处既有声如巨钟的叱咤叫喊,而亦并非一味叫喊,仍有“闲中着色”的细腻——这其实也正合于文章学的开合起落,富于变化。

不同门类的艺术各有其规律,其间又有相通之处——这就是艺术辩证法。任何单一的东西弄得太多了,就很容易干枯乏味,吃力而不讨好。

鲁迅文章之开合擒纵

□顾农



从化温泉

钱松岩作

星河

XINGHE



世人对钱松岩先生是否是大家多有非议,而我却十分喜欢钱松岩先生。钱先生的用笔有“枯藤倒挂巨石坠地”的意味,笔下的线条都很苍劲,而且特别留得住笔。小时候我特别爱临钱先生的画,好像这对我以后执笔涂抹有很大好处,落笔起码不会坠入细线飘渺的恶道。钱先生的女儿钱紫筠曾在我们那地方的报社工作过,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还有老舍先生的侄子,脸上有几颗碎麻子,为人十分和气。报社的人想让他向老舍先生求字,他写信回去,字马上就寄来了。钱先生的女儿也是学画的,好像报社要搞什么活动,请她写信向钱先生要一幅画,据说钱先生也是很快把画画好寄来。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而美好!我见到钱先生的原作还是老早以前,那张画贴在报社墙上,谁也不把它当回事,不是山水,好像是一幅花鸟,上边画着瓜,印象是藤老瓜大,下笔着色均十分老辣,点了不少墨点在上边,但上边更多的是——苍蝇屎!

钱先生那幅著名的代表作《红岩》,着色真是大胆,敢以大红画满峭石壁,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红色石壁上加上白色蕉,还有那株大树,像刀刻一样刻在了中国美术史的深处。及至那年中国美术馆搞馆藏展,我在这幅画的下边站了很久,一幅画在瞬间已经变做了一部书,让人翻来覆去地读。我注意到许多人都像我一样,对这幅画像是着了迷,看了又看,走开去,过一会儿再走

喜欢钱松岩先生

□王祥夫

回来。无论时下怎么说,我总以为这幅画是划时代的,且不管它是政治第一还是艺术第一,但对这幅画,我个人总评一个字——好!若再加一个字——真好!

画家怀一曾买过一幅钱先生的小幅山水,他拿给我看,看原作和看印刷品毕竟不一样,怀一收藏的钱先生那幅画的左下角的石头给我印象特别深,落笔很重,浓墨交加,十分醒目。钱先生画水勾线,赭石掺以淡墨,反面敷粉,效果与众不同。钱先生曾著一书,薄薄的一本,书名是:《砚边点滴》,我12岁上得到一本,看过多次,后来搬家,忽然找不到,现在有新出版的,封面和以前都不一样,装帧也好像不如以前。这本书里都是经验之谈,行文朴素大方,不故作高深。

钱先生的山水画中还有细节。画房屋,屋里总有人,乃至窗台上还会有花盆;画稻田,稻田里也总会有人,在锄地,在劳作,或者是收了工正往回走。钱先生的画面里有时还会出现红旗,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,别的画家也很少画红旗。钱先生的山水画生活气息特别浓,是有生活的画,而且,画里表现的是我们的生活,而不是古人的生活。就反映当代生活这一点,钱先生大有贡献。钱松岩先生从书法到绘画应以两个字评之:雄强。

当代画家用笔就“雄强”二字能超过钱松岩先生者,少见!



大白话

有话说不明处

□陈世旭

小时候上学,班上同学多数都反感喜欢在背后向老师告状的同学,其中告状最积极的往往是最孤立的,没人愿跟他玩儿。我自己因为常常吃这种同学的苦头——有些“状”是告状的人瞎编的,对这种同学就不光是反感,而是很讨厌了,好多年都不肯跟他们说话。

当然,那时候,告的和被告的都是孩子,都不懂事。

长大了才知道,“告状”并非什么坏事,上面说的那种“在背后向老师告状”其实应该叫告密。古往今来,告密曾经成为“群众运动”,受到朝廷的鼓励以至奖赏,许多人因为告密有功而获荣华富贵。但即便如此,告密者在常人心目中也未必有什么好的声誉——不论他的目的有多么崇高。而我的认识也许更为极端,一种目的如果不能见人,根本就谈不上崇高。正因为这样的认识,我很不喜欢时下流行的内战谍战剧。难道还嫌我们生活中的相互算计、相互构陷、甚至相互投毒太少吗?难道不觉得我们的生活离开温情、离开真诚、离开信任太远吗?这样的问题自然离艺术太远,很没文化——扯远了。

话说回来,所谓告密,就是有话不敢说在明处或者故意不说在明处。

再后来,我又知道了,告密有时候并不都那么可恶。大多数时候,我们大多数人有话不说在明处,总是有些这样那样的隐衷。笔者曾经参加多次文学评奖活动,多次亲历类似的情形:对公认有可能获奖的作品,大家发言踊跃,大声喝彩;对可能有争议的作品,尤其是有明显缺陷的但却是自己熟悉的同行甚至朋友的作品,表态就很迟疑,目光闪烁,用词谨慎,吞吞吐吐,心里指望的是最好有别人说出否定意见,自己含含糊糊地加以附和。平时在单位,这种情况就见得更多了:开总结评选会,说正面意见的时候,都可以夸夸其谈;一旦说到负面意见,有当事人尤其当事的领导在场,许多人就噤若寒蝉,常常冷场。遇到这种情况,一个单位要是没有一两个“炮筒子”,把话说在明处,会就往住开不下去。

世界是复杂的,有的人有话说不明处,遇上了能够善意对待的人,他很幸运;有些人性格率直却遇上了忌讳这个的人,他也许吃亏。结果的好与不好都有可能。这辈子我自己就因为这样的“二”幸运过,当然也吃过亏。

尽管我自己也不能保证做到每次都有话说不明处,但还是觉得,有话说不明处比窝在心里或不说在明处要好;敢于有话说不明处的人永远是我敬佩的人。高尔基说,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,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。一个人只要正直真诚,他的坦率最终是可以得到多数人理解的。

父母对儿女说话很少拐弯抹角,就是因为是出于真挚的亲情。而说话经常委婉曲折的人,通常让人觉得城府很深。如果一个亲朋好友对你说说话总是那么不明不白,你会觉得亲近和值得信任吗?事实上,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绕着弯子说话的人,别人往往会有心存警惕,而对直率的人通常不太会有戒心。原因很简单,淳朴自然、说话直率的人,往往不会太有心计。说话直率某种程度表明他做人的坦诚,这种人会比较受欢迎,容易进行心灵的交流,容易融入群体。即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,人们也会觉得比虚伪做作的人要好得多。即使吃了大亏,倒了大霉,他们的人品还是会得到善良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尊重。古往今来不乏这种淳朴率性的高洁狷介之士,他们心境澄明,独立于世,不染纤尘,受到长久广泛的推崇和纪念。而那些患得患失、从来都不敢伸张正义的人,就是得了天大的好处,还是被人们瞧不起。

当然,有话说不明处是需要勇气的。马克·吐温就说过:坦白是诚实和勇敢的产物。但不管怎样,有两位名人的话,我认为值得谨记的,一位是夸美纽斯,他说: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;一位是艾略特,他说:正义像上帝的王国,它不是我们身外的一个事实,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热烈向往。有所看到的一件事情,一种行为,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除了语言有所斟酌外,观点一定要明确。倘若老是费劲地去猜测别人会怎么想,长期下去,不知不觉就可能变成一个虚伪的人、一个口是心非的人。

“对自己真实,才不会对别人欺伪。”莎士比亚说得对。而一个“对自己真实”的人,是心灵最自由的人;相反,“一个虚伪的人,一个口是心非的人”,其实是心灵负担最重的人。正所谓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”。二者谁活得更爽、更快乐,不言自明。